

金圣叹与弗洛伊德的文学 创作心理理论之比较*

刘南南

(兰州大学中文系, 甘肃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 金圣叹和弗洛伊德都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 其理论的显著特色之一就是挖掘人性。本文尝试以《作家与白日梦》和《金圣叹评西厢记》为例, 考察两人从文学创作角度对人的心理表现这一命题的阐述, 比较两者理论诸多可沟通探讨之处, 并探究其相似的原因。

关键词: 弗洛伊德; 金圣叹; 创作心理; 人性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2003)02-0027-05

《作家与白日梦》是弗洛伊德的一篇经典文学专论(写于1908年)^①, 集中反映了他对文学创作的认识。弗洛伊德借助心理学的研究分析了具有复杂的意识现象的文学活动。他的文学理论无视社会、历史对文学的作用, 无疑是偏颇的。从开始发表就不断受到批评。但无论如何, 其思想还是整整影响了一个世纪人们的思考方式。正如波林在《实验心理学史》中的评价:“(弗洛伊德)被视为最伟大的创设者, 时代精神的代言人”, “他对知识的贡献在于他改变并带来了成熟的思想体系。”

《西厢记》号称元杂剧的压卷之作, 美誉天下。自传世以来, 对它的评论可谓长盛不衰。其中, 金圣叹批点的《西厢记》^②可视为《西厢记》评点中的集大成者。在他批点后, 百年间, 其批本大有取代诸批之势, 并且甚至有人只知金批而不晓原著。金批的突出特点同时也是巨大成就所在, 即以人物为核心评说。金圣叹犹如一位向导, 带引读者步入人物的内心世界, 又促使读者借此反观自我, 从而努力揭示出人性中某些最本真的因素。

金圣叹和弗洛伊德, 可以说, 分别鲜明地代表了古代中国、现代西方关于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挖掘人之本性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 他们的文学创作人性观具有诸多可沟通之处。本文就以他们的这两篇经典文论为例做一比较分析。固然两种理论不能一一对应、完全吻合, 但以此合理成分反观彼相关

内容, 或许可以对二者做出一个合理的当代审视。

金圣叹批点《西厢记》是笔随兴至, 但其论核心是如何进行文学创作, 总的看可划分为两类: 方法论、人性论。前者涉及到文学创作的种种笔法, 这是其批点的重点所在, 占了绝大部分篇幅; 而后者则围绕人的心理意识(包括创作者和作品人物)展开论述, 是批点的精神实质所在。本文谈论后者。

首先, 关注创作者的心理。

金圣叹在评点中, 不时赞叹《西厢记》的作者是怎样拥有如此精彩的慧心妙笔, 写出这样绝美的文章。这也就是弗洛伊德在他的开篇提出的问题: “我们这些外行一直怀着强烈的好奇心, 想知道那种怪人(即创作者)的素材是从哪里来的, 他又是怎样利用这些材料来使我们产生如此深刻的印象, 而且激发起我们的情感?”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引领我们走入创作者的内心世界。

第一, 在批点的“读法”中, 金圣叹说: “《西厢记》是《西厢记》文字, 不是《会真记》文字。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 不是《西厢记》文字。天下万世锦绣才子读圣叹所批《西厢记》, 是天下万世才子文字, 不是圣叹文字”。

而弗洛伊德在文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创作家们自己喜欢否定他们这种人和普通人之间的差

* 收稿日期: 2002-10-14.

作者简介: 刘南南(1978-), 女, 陕西西安人, 硕士生,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距,他们一再要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在内心都是一个诗人,直到最后一个人死去,最后一个诗人才死去”。

这就是说不仅是《西厢记》,文学作品对于读者产生的效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西厢记》”,所以人人都可以是创作者。

第二,既如此说那么创作者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就是任情自然表露。金圣叹认为“《西厢记》其实只是一字”,“是此一‘无’字”。他举说赵州和尚解释佛性所用之“无”字,正体现了此人的“真才实学”,以此例证明这个“无”字不是有无的无,而是一种创作者的心态。概括地说,它表现为“总是写前一篇时,他不知道后一篇应如何”。“总是写到后一篇时他不记道前一篇是如何”。金圣叹之意是说,《西厢记》是不着人力斧凿、自然而成的。提笔前,作者胸中隐约有竹,而它们潜在地涌动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创作者只要不凭主观、顺其自然地表达,就会创作出神品。他以云的生成做喻说明创作“无成心之与定规”:“云只是山川所出之气,升到空中,却遭微风,荡作缕缕。既是风无成心,便是云无定规,都是互不相知,便乃偶尔如此”。(以上引文仍见“读法”)。金圣叹所论与弗洛伊德所持创作实质是人的本性得以发泄的观点是一致的。

一种微妙的创作心态被形象地解释出来了。但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弗洛伊德进一步做了回答。他认为,人在童年时都会以全部热情投入游戏世界而获得快乐,在游戏中每一个孩子的举止都像作家。人长大后不再游戏,但那种长久被压抑的心理冲动使人们“从来不可能丢弃任何一件事情,只不过是把一件事转换为另一件事罢了”。“现在做的不是游戏,而是幻想。他在虚渺的空中建造城堡,创造出我们叫做白日梦(或幻想)的东西来。大多数人在他们的一生中时时会创造出幻想”。

显然,这里的“白日梦”不同于一般所说的意义,它是并不根据道德规范进行的幻想,而是本能冲动要求得以满足的产物。所以它往往很私人化,如果用道学家的眼光审视,那就纯粹属于丑恶的、淫秽的心理。就像弗氏所说:“一般说来,他(创作者)宁愿坦白自己的过失行为,也不愿把他的幻想告诉任何人”。这样,由于所写之事、所抒之情都出自创作者早年已有、多年沉淀的内心私人化的心理,那么只要顺势付诸笔端,自然就创作出了挚情

佳作。而作品又因往往表达了人们共有的私念,便格外具有感召力。

追求真实的自我情感的实现是人之本性。就金圣叹本人也是创作者而言,其批点的心态也是如此。他在《惊艳》小序中写道:“然则今日提笔而作曲所写,盖皆我自欲写,而于古人无与……夫天下后世之读我书者,彼岂不悟此一书中,所撰为古人名色,如君瑞、莺莺、红娘、白马,皆是我一人心头口头吞之不能,吐之不可,搔爬无极,醉梦恐漏,而至是终究不得已,而忽然巧借古人之事以自传,道其胸中若干日月以来七曲八曲之委折乎?……夫天下后世之读我书者,然则深悟君瑞非他君瑞,殆即著书之人焉是也;莺莺非他莺莺,殆即著书之人之心头之人焉是也;红娘、白马悉复非他,殆即为著书之人力作周旋之人焉是也。如是而提笔之时不能自爱,而竟肆然自作狂荡无礼之言,以是愉快其心,是则岂非身自愿为狂且,而以其心头之人为倡女乎?”金圣叹借批点《西厢记》表达自己心存已久的种种思想、感悟,而所说的又正是读者的共想,自然写作时下笔如神,读者阅读时也感到酣畅淋漓,彼此产生情感共鸣。

第三,弗洛伊德认为:“作家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表现在素材的选择和改变上——这种改变往往是很广泛的。不过,就素材早已具备而言,它是从人民大众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宝库中取来的。这很可能是所有民族寄托愿望的幻想和人类年轻时代的长期梦想被歪曲之后所遗留的迹象”。

同样的,金圣叹认为:“想来姓王字实父此一人亦安能造《西厢记》?他亦只是平心敛气向天下人心里偷取出来。总之世间妙文,原是天下万世人人心里公共之宝,绝不是此一人自己文集”。

《西厢记》取材于民间传说、小说戏剧已有的素材,对其进行了完全崭新的重创作,它抓住了“天下万世人人心里之公共之宝”;即人类本有的情感欲望,绘写出人人不敢言而心中常常想之情,表达了所有人的白日梦——“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金圣叹把《西厢记》第五本贬得一钱不值,但却连连称赞此句:“结句实乃妙妙”。又在“读法”开篇辩解《西厢记》绝非诲盗诲淫:“《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耳”。在《酬简》的小序中他又提出“自古至今,有韵之文,吾见大抵十七皆儿女此事……夫为文必为妙文,而妙文必借此事。事妙,故文妙;今

文妙，必事妙也”。足见，金圣叹认同创作家的审美心理应是趋于实写人欲之本质的。

其次，关注剧中人物的心理，这主要体现在场次的设置中。

弗洛伊德认为“创作家以非常认真的态度——也就是说，怀着很大的热情——来创作一个幻想的世界，同时又明显地把它与现实世界分割开来……然而，作家那个充满想象的世界的虚构性，对于他的艺术技巧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效果，因为有许多事情，假如是真实的就不会产生乐趣，但在虚构的戏剧中却能给人乐趣；而有许多令人激动的事，本身在现实上是痛苦的，但是在一个作家的作品中却成为听众和观众乐趣的来源”。

虽然有时间的先后，但因为反映了共同的真理，《西厢记》的创作的确实可以作为弗氏这一论断的佐证。金圣叹的批点也完全关注到了《西厢记》是如何使现实的苦痛不断在精心的情节安排中转变，人物心理贯穿于情节演变之中，从而牵动读者也随着剧情而变化感情。

在现实中，相国千金和布衣书生根本不可能自由见面，爱情从何而起？金圣叹在《惊艳》中批注：“乃丧停而艳停，艳停而才子停矣。则实为相国有自营菟裘故也”。又注：“罪老夫人也。一念禽犊之恩，遂至逗漏无边春色”。其实，相国停丧西厢、老夫人开春院只是万事的引爆器，金圣叹此说无非是把这种为礼不容的爱情的发生合理化。

主人公不是市井浪子娼女，金圣叹赞他们，一个是“周公之礼，尽在张矣”；一个是“天仙化人，一片清净心田”。这样知书达礼的人怎么会私约西厢呢？弗洛伊德做出了回答认为，人性的本能“或者是野心的欲望，要想出人头地；或者是性欲的愿望。在年轻的女人身上，性欲的愿望占极大优势。在年轻的男人身上，利己和野心的愿望十分明显地与性欲的愿望并行。我们要强调这一事实：它们常常结合在一起……一个有良好教养的年轻女子只允许怀有最起码的性的欲望；年轻的男子必须学会抑制自己在孩提时代所养成的过分注重自己的利益的习惯，以使自己能够在一个提出了同样强烈要求的人们的社会中，明确自己的位置。”因此莺莺既有一出场就唱：“花流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这种被压抑得只被允许在心里悄悄地动一动春思，幻想一下心仪之人的爱情渴望，就有其后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逐渐激扬起压抑于心底的情欲。相比之下，张生的情感简单直接。戏剧开场就表明他

有出人头地的野心，金圣叹评道：“满胸前刺刺促促，只是一色高才未遇说话。”“惜黄河以快比张生之品量。试看其意思如此，是岂偷香傍玉之人乎哉！”正如弗氏理论，张生一直执著于自己的情感要求，是与他坚持个性的习惯有直接关系。但之后他就必须学会抑制这种习惯，去接受老夫人的成亲条件了（这也代表着一种普遍的社会秩序要求）。

接下来的《借厢》和《酬韵》两折分别将张生、莺莺的态度明朗化，他们开始把心中的渴望与追求付之行动，张生热切积极、莺莺谨小慎微。然而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墙牢牢地挡在两人之间，即使是在《闹斋》中彼此细细打量，更加心心相悦了，它也无法逾越。而读者一想到现实中种种痛苦的爱情人生，就不由感到剧中人物的爱情将被窒息在无尽的等待中了——人人胸中郁闷。金圣叹在批阅《待警》中说明，创作者巧设情节让读者眼前一亮，顿扫胸中闷气。“今乃不端不的出自意外，忽然鼓掌应募，驰书破贼，乃正是此人，此时则虽欲矫情箝口，假不在意，其奚可得？其理、其情、其势固必当感天谢地，心荡口说，快然一泻其胸中沉忧。”“斗然从他递书人身上凭空撰出一莽惠明，一发泄其半日笔尖鸣鸣咽咽之积闷。”老夫人许婚、张君瑞破贼。此时欢乐的祥云笼罩着普救寺。《请宴》小结旧愁，《赖婚》重开新怨。刚刚从天降喜庆，既而就晴天一霹雳！老夫人轻描淡写地赖婚把所有人从玄美的幻想中拉进无助的现实：气氛再度沉郁下去。

弗洛伊德指出：“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只有愿望未满足的人才会。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次愿望的履行，它与使人不能感到满足的现实有关联。”“要一个人放弃自己曾经历的快乐，比什么事情都更困难。”张生的处境正是这样。追思往昔，莺莺临去一回眸点燃了他的希望；莺莺酬韵让他鼓起了勇气；老夫人请宴令他欢悦醉心……就是爱情不得实现，就是这些曾经的幸福难忘，激励着张生义无反顾地追求下去。莺莺也是如此，因此才得以和张生心照不宣。

当仿佛失败已注定时，斗然又跃出一个小侍女。红娘不仅给人们重燃希望，而且最终把希望促成了现实。这期间（《琴心》、《箭候》、《赖简》、《后候》、《酬简》、《拷艳》），莺莺真亦假、假亦真，张生喜而忧、忧而喜。之后，又经历张生远别赴考（《饯宴》、《惊梦》、《泥金报捷》、《锦字缄愁》），郑恒登门求配等等诸般事故。直到衣锦荣归、终成眷属，人们紧悬的心才释然。主人公这一路走来起起

伏伏,而人们的感情也随着他们的经历腾挪跌宕。

在理学成为社会主导思想的古代中国,以自由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只能是美好的梦想。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最现实的结局应该是像元稹《会真记》所写的那样,痛苦悲哀而无奈。而用上述弗氏理论反观,

《西厢记》正是在不动声色的铺写中给读者带来了梦想的快乐。而金圣叹则在各个重要关目转变处点明人物的心态、读者的感触,将剧中剧外所有人的情感表达无遗。再次,金圣叹对于剧情最显著的批改是删去了第五本,以《惊梦》剧终。笔者认为不可取。首先从传统的叙事角度讲,剧情发展到《惊梦》并没有结束。它和下一折一起分别备写出张生、莺莺各自的相思之状,作用犹如《借厢》和《酬韵》分别明朗两人的态度一样。同时,它们承上启下,小结过去的波折,引发新的事端,从而把前文隐藏的郑恒的情节做出了结,使全剧情节再无遗漏。其次,就情绪效果而论,金圣叹认为删去第五本就是悲剧结尾,从而加重了批判力度。实际上,以一梦作结带给人们更多的是对最终结局的猜测,这种模棱两可的结尾不会产生悲剧的震撼力,人们不会放弃对美好结局的幻想猜测。同时,崔、张接受成亲的条件,表明进步的自由爱情向封建礼教做出了妥协,这种不彻底的解放更是一种悲哀,它的批判反而比正面批判更有力度。第三,从本文探讨的人之本性角度而言,弗氏理论指出,得不到实现的欲望将引起幻想,但“我们不能假设这种想象活动的产物——各式各样的幻想、空中楼阁和白日梦——是固定而不可改变的。相反,它们根据人们对生活的印象的改变而做相应的更换。幻想同时间的关系一般很重要。精神活动是与当时的印象与当时的某种足以产生重大愿望的诱发性场合相关连。从那里回溯到早年经历的事情,从中实现这一愿望;这种精神活动现在创造了一种未来的情景,代表愿望的实现。它这样创造出来的就是一种白日梦,带着诱发它的场合与往事的原来踪迹。”可见这种精神活动具有完整的发展过程。“过去、现在和未来就联系在一起了,好像愿望作为一条线,把它们三者联系起来。”剧中,莺莺就是在不断变化的幻想追求下完成情感历程的。早年她被指婚给郑恒,显然是不满意的;后又处在暮春伤父时巧遇张生的情境中,自然地勾起她心底埋藏的情思:“愿配得冠世才学、状元及第、风流人物、温柔性格”!过去的经历焕发出当前的幻想。之后又经历了起起落落、百转千回的曲折,熬到长亭哭别。为了美满的爱情这个

梦想,她又忧虑张生是否能钟情不渝——“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想象着未来的种种情景。再看张生,《惊梦》一折是现在的经历,野店一梦牵连起过去普救寺酸甜苦辣的种种回忆,那么弗氏所说的作为线索的愿望连接的未来情况呢?若删除第五本,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就不得而知了。

《西厢记》描写了爱情的发生、发展、结局的全过程,现实种种痛苦的不可能,在经过层层技巧的运用后,成为美好幻想的可能,带给人们乐趣。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最根本的诗歌艺术就是用一种技巧来克服我们心中的厌恶感。”“实际上一种虚构的作品给予我们的享受,就是由于我们的精神紧张得到解除。甚至于这种效果有不小的一部分是由于作家使我们能从作品中享受到自己的白日梦,而用不着自我责备和害羞。”

—

不难看出他们的思想仍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评《西厢记》为金圣叹晚年所做,可以说是他一生文学思想的集中反映,因此还可见到在相当程度上他强调了礼法对人的创作心理的作用。同时受传统学术的浸染,并体现出民族风格,金圣叹的评说更具抽象的感悟性。而《创作家与白日梦》则是弗洛伊德前期的文论著作,是以临床治疗的实践科学为理论依据的。以后他更加义无反顾地进一步深发,甚至将人性本能的作用置于绝对支配的地位,最终实现了精神分析法在文学研究上的运用。和金圣叹相比,他的理论非常激进,同时显出严密的科学分析的层次性、系统性。

尽管两人的理论显著区别,但仍能挖掘二者可沟通之处。他们认为一方面文学创作是人类共有的自然情绪的抒发、纯然心理的表达、本质欲望的写真,因此文学创作就是打造投射人性的镜子。另一方面创作心理明显地倾向于个性的展露,无论是创作者的心态还是作品人物的言行,无不被个性的光芒烛照着,正所谓“每一个人在内心都是一个诗人”。简而言之,他们的创作心理理论核心的相似处就是充分肯定人的自然天性。

这样探寻并不是要将一种西方理论强行对照于另一个中国古代文论,其意义在于说明这种相似性的原因,进而探讨某种文学现象的原因。

首先,从学术思想的演进来看,明代中后期复兴的商品经济推动社会世俗之趣扩展,一时成为万众响应的审美趋向。^[5]自然而然地,社会风气日益开

放活跃,而最终汇集为复苏人欲、张扬个性的艺术思潮(即尚情论)。作为那一批新思想倡导者中的一员,金圣叹自然会继承其肯定人性的精神,只是其所论显示出新的时代变化亦是必然,即向理欲思辨的深化。因此在金批中,既有维护礼教的保守复古之论,又有响应时代的惊世革新之语。

20世纪初,西方现代科技迅猛发展,政治形势风云变化,现代工业社会的现实猛烈地涤荡着人们惯有的思维方式,因此传统学说在经历了19世纪的辉煌后,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批判。同时种种非理性的、异化的思潮风行于世,论者多关注人的心理、直觉、意识等方面,于是逐渐改变了人们过去所持“人是理性的”观念。弗洛伊德的学说就是其中极具时代学术特色的代表。他质疑人的本性,“深入地研究了关于‘无意识’精神活动的理论,并用来分析人类行为动机”。他的理论体系和描述性的术语词汇,渗透到整个西方现代文化的各个领域^③。

金圣叹和弗洛伊德都身处时代的大更替、社会的大变动中:一个是明清易代,一个是世纪之交。新旧社会状态的碰撞伴随着新旧思潮的碰撞。其中文艺思想必然体现出批判性。这两个时代思潮氛围都呈现出关注人性、侧重内省的趋势,因此两人所论皆关涉此命题。

其次,这种学术以人性研究为主导的倾向,又有更深层的时代原因。当物质文明不断提高时,伴随物质世界的极大丰富,人的精神状态必然要经历最初对物质利益的极度追求依赖阶段,即“人的自由度反而降低,异化程度则加深”^④,于是人的世俗情性为社会公认而被极大张扬。文学是时代风貌、社会心理的艺术再现。当创作实践在不断超越传统时,相应所做的理论亦围绕共同的命题开展。

金圣叹和弗洛伊德的时代正例证了这一点。明末,内地的起义、沿海的外寇将偌大国家陷入天翻地覆的混乱中,满清政权重整江河,一切混乱又都纳入了秩序中,人们重获生存的稳定感。而20世纪初,现代科技的飞跃前进成为社会巨变的根由和动力,各种传统都被怀疑甚至打破,混乱代替了秩序,一种长久的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在渐失。尽管这是两个相反的过程,可却有近似的结果:统一的政权大力发展经济;现代科技革新了生产力——比较各自的过去,物质水平都大大提高了。于是文学上,有在实践中描绘人的本性,而创作论上侧重人的内省分析的倾向。

对于金圣叹和弗洛伊德的创作心理理论做出以上比较只是一种尝试。每一种理论都有它独特的氛围,对于西方文论,显然不一定能照原样的洋为中用,但这种中外理论的互学应该还是有意义的。

注 释:

①马新国. 西方文论选讲 [C]. 大连: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7. 374 ~ 384.

②陈德芳. 绘图本金圣叹评西厢记 [Z].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0.

③伍鑫甫. 西方古今文论选 [C].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391.

④郑克鲁. 外国文学史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100.

A Comparative Study in Literary Psychology: JIN Sheng-tan and Sigmund Freud

LIU Nan-n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maintains that JIN Sheng-tan and Sigmund Freud share certain literary tenets, the most obvious among them being their insightful scrutiny of human psychology.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JIN's "Notes on the Western Chamber" and Freud's "Writers and the Daydream", the paper analyses their common ground i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reasons underlying this common ground.

Key words: Freud; JIN Sheng-tan; creative psychology; human nature